

毛边举隅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合订初版本

■陈子善

《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是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著,也是国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的局面,其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自不待言。

《史略》本是鲁迅据自己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整理而成,故其版本源流颇为复杂,先后有油印本、铅印本、新潮社本和北新书局本等,新潮社本又有上下册初版和上册再版本。每次重印都有修改,其增删改动之频繁,在鲁迅所有著作中首屈一指。

笔者日前得到一册“1925年9月再版合订”《史略》,北京北新书局发行。此书32开本,曰“再版合订”,是相对新潮社1923年12月上册初版和次年6月下册初版而言,实系北新书局首次上下册合订,也即合订初版本也。

《史略》合订初版本封面书名“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由鲁迅亲笔行书竖行书写,置于封面右

上方。书前有鲁迅1923年10月7日作《序言》1页,《序言》反面又有1925年9月10日作《附识》一则(原文无标题),《目录》9页,正文345页,书末有鲁迅1924年3月3日作《后记》1页,《后记》之后又有《正误》3页。全书直排,每页12行,每行36字,与新潮社上下册版式一致,可见北新《史略》合订本系借用新潮社纸型合并而成,附录了新校勘的《正误》而已。

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史略》合订初版本系道林纸毛边精印,且是书顶和书口毛边。在鲁迅督促下,北新书局印行的新书大都采用了毛边本的新形式,《史略》合订初版本也因此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本毛边本专著,其版本价值可想而知。

鲁迅当时对《史略》合订初版本,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查鲁迅日记,1925年10月7日云:“下午往小峰家取《中国小说史略》二十本,《呐喊》五本,《陀螺》八本。”从当日起至10月25日,据日记明确记载,鲁迅先后赠送《史略》合订初版本给胡成才、许寿裳(两

本)、章锡琛、郑振铎、谭正璧、许钦文、韦素园、韦丛芜、高长虹、向培良、宋紫佩、王希礼等12位中外友人(按赠送时间先后为序)。在此期间,鲁迅日记还有郁达夫、台静农、李霁野、章衣萍、荆有麟等来访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断,20本《史略》合订初版本很快送完,所以10月30日鲁迅又“午后访小峰,取《小说史略》五本”了。

有必要补充一句,鲁迅10月7日取回的8本《陀螺》(1925年9月新潮社初版),在此期间也分赠许寿裳、许钦文、韦素园、韦丛芜各一本。其时兄弟早已失和,鲁迅仍把弟弟新出版的译著分赠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友人和后学,耐人寻味。

对《史略》合订初版本,还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合订本中有7幅“尾花”。这是在鲁迅著作中,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的特殊现象。“尾花”者,《出版词典》的解释是“书刊中,装饰在文末的图案”。《史略》正文28篇,其中第1、2、4-6、10、11、13、17-22、24-27篇均为双页结尾,无“尾花”;3、7、8、9、

12、14、15篇为单页结尾,双页印有“尾花”,但16、23、28三篇也是单页结尾,双页却仍空白,无“尾花”。这7幅“尾花”中,有花鸟、盆景和茶具等图案。书中加入这些“尾花”,到底是北新编辑所为,还是鲁迅本人的意见(鲁迅可是很懂美术和装帧的),尚不得而知。

其二,《史略》合订本中《序言》之后的一则《附识》,1931年7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史略》新订正本时,被删去了。当然,这则《附识》现在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中,题为《〈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但是,在笔者看来,所谓“集外文”,当指鲁迅生前在报刊发表后从未编集之文,或未能发表而保存有手稿者。这则《附识》明明已经收过“集”,即收入过《史略》合订初版本,怎么能算从未收集的“集外文”呢?因此,合理的处理方法,应将其作为《中国小说史略》最后修订本的“附录”编入《鲁迅全集》第九卷,而不是作为“集外文”编入《鲁迅全集》第八卷。



《中国小说史略》合订初版本



《史略》合订初版本「尾花」

据《史略》合订初版本版权页上的题字,此书原由一个名叫刘璟的人于1926年4月26日购得。此书毛边已全部裁开,书中还有不少钢笔校勘(包括《正误》未校出者)和圈点,可见其认真读过。后来此书又归北京已故新文学爱好者王子泉所有,可谓流传有绪。

(上接第一版)

接着我写了《听王映霞老师谈吃》《我记忆中的鲁迅和许广平》《你们好,我的新朋友》《王映霞的第一本书——〈我和郁达夫〉》《王映霞谈邵洵美》《王映霞为蒋光慈介绍女友》《王映霞·王莹·池田幸子》等文章。

王映霞晚年的和谐家庭

一个人的长寿,除基因外,最重要的是与和谐的家庭有关。王映霞老师与郁达夫离婚后,与钟贤道先生结婚,我称他钟伯伯。他是位心地善良、为人忠厚的知识分子。

结婚时,钟伯伯对王老师说:“我懂得怎样能把你的已经逝去的年华找回来。我们会有一个圆满的未来的,请你相信我!务必要相信我!”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孩子钟嘉陵和钟嘉利,生活得很美满。王老师1952年12月被囹圄生活20天,后又无罪释放。当时把钟伯伯急坏了,四处打听,接着又想方设法给妻子送东西。在里面,王老师没哭过,因为她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可是看到亲爱的丈夫在门口接她时,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淌下来。钟伯伯很会体贴人,在国际饭店开了间房,让爱妻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天,然后两人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旅游了半个月。王老师觉得像在度蜜月,幸福极了,终生难忘。钟伯伯对妻子是言听计从。有一回,我在她家里为注释《达夫书简》而忙着,只听得王老师对钟伯伯说:“去做点汤团给小丁吃。”

“哎!”钟伯伯答应着,连忙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箱子,取糯米粉。过一会儿,热腾腾、香喷喷的两碗汤团端了上来,我忙去接,王老师说:“你别动,让他端。”

钟伯伯说:“我来,我来!”

“钟伯伯,你的呢?”我问道。

“我有,我有。”说着,走到后间去了,也不知道是真有,还是假有,因为我不好意思跟着他到后间去瞧个明白。

这使我想起王老师曾对我说的一件事情。她告诉我,每次烧水铺蛋,总是她吃蛋,

钟伯伯喝汤。也许,钟伯伯到后间去喝汤了。

1980年11月19日钟伯伯因病去世。王老师无限悲伤地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外公,我和他共同生活了38年,是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帮助的38年。”

王老师的一双儿女非常孝顺,哥哥在深圳,妹妹在杭州。父亲去世后,他们俩不是把母亲接到深圳,就是接到杭州与他们一起生活。王老师非常热爱生活,房间里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床被叠得整整齐齐,而且经常换新床单。我有一次去,看到床单是白底上大红的圆圈圈,沙发扶手上是红和白色直条子的毛巾,可好看了。我说:“这床单和沙发上的毛巾是新换的?真好走进新房。”

“这是我前几天经过布店,柜台上一块白底红圆点的布吸引了我,那圆点好像是钟贤道眼镜片上的闪光点,又好像是我小外孙和小孙孙衣服上的纽扣。我一步跨进布店,就买了许多,我用它做条新床单,与沙发上的红白条子的毛巾相互辉映。”王老师说。

她从来不买名牌的衣服或包。有一次,王老师约我陪她到城隍庙去买包,说她几天前买的包被女儿拿去了。那时,她家门口有一辆24路电车,直达城隍庙。我陪着王老师东逛西望,忽然王老师指着一个黑包,说:“就是这只。”我一看,价钱不贵,10元之内,不过式样很大方。

王老师每天都穿得很鲜亮,很得体,很有气质,看上去就是一位有文化的老人。有一次,她寄给我一张照片。我看了眼前一亮,王老师穿了件粉红加翠绿大花的衬衫,一般人家会觉得太“乡气”,可穿在她身上很美。衣服美不美,要看是什么人穿的,对吗?

王老师和王老师

王老师爱好拍照,我们经常在她家门口拍,因为她家隔壁是所幼儿园,墙上画满了卡通图案。

王老师还爱写信,每次信中总忘不了

说:“向你爸爸妈妈问好。”给我的信中说:“爸爸妈妈都好,他们写信也怕烦了,只有我,永远不怕烦,而且总在清晨半夜起来写,像现在才两点钟,我就在为你写信,要不要看随便你。我是有那么多的精力呵!”(1996年1月22日王映霞致丁言昭)

受王老师的鼓励,我妈妈一改十几年不写信的习惯,居然也写起了信。我妈妈叫王汉玉,也姓王。爸爸常说,这两位王老师可要好了,不是你来,就是我去,吃过来,吃过去。王老师说:“我在你妈妈家也不知道吃过去多少顿饭,现在已经算不清了。”(1996年1月9日王映霞致丁言昭)记得有一次,妈妈看到王老师穿了一条棉裤,觉得颜色很好,式样也挺满意的,便问这是哪里买的?谁知第二天,王老师拿着新棉裤送到我家来了。

“映霞吾友雅嘱”

1988年,父亲为王老师写过一幅字: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录北宋王安石诗句以应映霞吾友雅嘱

景玉书

1988年6月10日于沪上

“景玉”是父亲将自己和母亲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他经常自称景玉公,一些篆刻名家为他制过好几方印章。

父亲为什么写这幅字呢?我有点记不起来了,可是在另外一幅字上,我找到了答案,那是1988年1月父亲在安徽滁县写的。

1987年冬,余偕凉漱养病琅琊山野。一日,接三女自沪寄来家信,谓1988年1月25日(旧历丁未12月22日)为王旭姑母八秩寿辰。乃书宋人王安石《江上》一诗以祝: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景玉书

1988年1月于滁州琅琊山野小筑

“凉漱”是母亲的另外一个名字,“王旭”是王映霞的名字。外人可能不太知道。

从父亲写的“王旭姑母”、“吾友映霞”等字眼来看,父亲完全认可我与王老师忘年交的来往,并没有因为楼先生的反对而阻止我们的来往。记得1980年代初,我为王老师的书《达夫书简》做注释、1990年代初我为王老师写传时,父亲也出了不少力,做了许多工作。王老师为了感谢父亲,送给他一把她外祖父王二南的扇,后来好像转送给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了。

父亲有时会请教王老师。1996年1月12日父亲写:“你记起一些事,可我忘了。我这人随随便便,是自己人,直来直往。如要回忆,我也记不起,是你为嘉莉(利)印江山地图托赵景深先生(真是个大好人)介绍来的。不知是不是?”“还要问一个地名,我1944年春第一次到杭州,领导浙大的学生抗日工作。旧浙大在学院路、大学路,还是将军路,还是场官弄?离开你们‘风雨茅庐’很近的。”最后又说:“你的笔头灵活,随手写几句答案给我。这次,出了两道题目,征求答案。下次再出x道题目,征求解答。”下面署名“景玉公”。

1996年1月16日,王映霞在给父亲的信中,详细回答了父亲的问题。她说:“嘉利由于写江山市地图,第一次踏进了家的门。这是对的。我和赵景深先生较熟,当年他和北新书局李小峰的妹妹结婚时,在从前的四马路振华旅馆,我还去吃过喜酒。”接着又回答另一个问题:“1944年的旧浙大,是在大学路上,旁边就是浙江图书馆,再旁边,是我们住过的庵堂,再旁边,就是后来的‘风雨茅庐’也就是场官弄口,你曾去拍过照片的(王旭界),这些答案对不对?”

最后,王老师加了一笔:“现在是16日清晨四时。”哇,王老师居然清晨起来给我们写信,好感动啊!

王老师在为我她整理的《王映霞自传》里说:“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